

导 论

抗拒失语就是敢于倾听和应答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就是让自己的感觉、经验、思想进入语言，就是宁可不说宁可沉默也不说那些虚假的不知所云的“他者”语言，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被膨胀的权力话语、商业广告话语所蛊惑和劫持，就是用语言之光朗照自己内心的蒙昧和黑暗，就是从罩在我们头顶的那张失语的大网中突围而出。

刘思谦（荒林主编，2002，3）

妇女史有两个目的：将妇女还原到历史中去；为妇女重建我们的历史。

琼·凯利—加多（王政、杜芳琴主编，1998，83）

本书指的中国女工工作史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中国女工自产生之日起到今天的历史，它是女工队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简称为中国女工史；二是中国女工生命历程中的工作史，是女工作为一名社会生产者的职业发展史。无论是女工史的全部历程还是女工个人的生命历程，女工工作史嵌入在她们身处的历史长河中，并与她们身处时代的工厂制度、工人阶级的整体地位、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性别话语相关联。因此，本书分为两部分，上卷为中国女工工作史，下卷为中国女工职业生涯。

异化与抗争代表了女工工作史的两大大特点。中国女工的命运被国家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的力量整合进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利益、单位利益和家庭利益皆塑造她们的职业活动。异化显示了女工工作被各种非自身力量所左右的状况，抗争表达了她们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写这本书是个艰难的过程，从 1998 年酝酿做中国妇女职业发展的课题开始便处于不断地寻找与摸索过程中。它的艰难在于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即使在写完之后，依然觉得想说的话还是有些语焉不详。事实上，我努力想做的事情简单明了，就是了解和展示当代中国女工的工作和生活。为了知道今天女工的工作和生活，不得不去了解昨天的中国女工，并思考明天她们的工作和生活。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的无力、不确定和同义词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差异性，因为我在努力避免用自己主观的判断去解释女工们的生活，而是力求用她们的语言和她们对工作和生活的理解来说她们的故事，危险在于主流社会的话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第二个困难是理论上的，当把研究定位于女工时，各种主流社会学理论都显得苍白，她们的生活和工作是那么的多元和充满能动性，僵化的理论无力去解释。因此，我用她们的声音替代了理论，并希望通过女工自己的声音对主流理论进行反思和重构。

一 问题的提出

1949 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女性增加了新的角色，她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但是在说到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和 1979 年后中国经济稳定快速的生长时，“主流”学者们无不把这种成绩归功于党的几代领导人的领导，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然而对于那些每天努力工

作、忙碌的女性劳动者们却很少有人会提到她们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和做出的贡献。这些劳动着的女性不仅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劳动力（见表 1），还是中国社会基石——家庭里的主要支撑者。

表 1 中国劳动力的性别结构

年份	女性占总劳动力的比例	女工占工业或制造业的比例
1898	34	—
1914	37 +	—
1933	36 +	40 +
1949	7.5	—
1953	11.68	6.1
1957	—	13.1
1962	—	16.7
1965	—	16.4
1978	32.9	36.6
1980	36.0	39.8
1990	37.7	41.4
1995	38.6	45.2
2000	38.0	43.2

注： 1898—1949 年数字统计见第一章。 ②1990 年以前，为女性占工业劳动力的百分比， 1990 年以后为制造业女性劳动力的百分比。 ③1953—1965 年的资料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5 年）提供的这些年份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人数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部门中女职工人数重新计算所得。 ④1978 年后的统计资料摘自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社会与科技统计司编《中国性别统计资料》（1990—1995 年）。2000 年数字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 年）。

上述统计数字虽然不够全面，但可以看到中国女工在中国工业化之后一直在劳动人口中占重要比例。长期以来，在“主流”话语中女性劳动力仅仅处于被叙说的位置；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女性劳动力成为历史中的“配角”，至多是一个“曾经被三座大山压迫的”、“被解放”的角色；在赞美社会进

步的历史叙述中她们至多是一个“陪衬”。在“正统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中，女性劳动力被简化成为抽象的数字和结构类型；甚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者的眼中，女性劳动力亦成为商品或工具，她们代表了可以实现的价值和可能的利润，她们是可以被再重构和控制的“劳动力”。在“主流”学者的眼里，女性劳动力的客体地位始终如一，她们是依附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实上，中国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积极意义和辉煌成就在于它赋予了女性新的角色，她们不再仅仅是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而是钳工、服务员、干部、教师和经理。这种打破传统两性劳动的分工使女性第一次可以通过社会角色——职业角色确立社会身份，而不用再依靠父亲、丈夫或儿子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这是女性从“无我”到“有我”的过程。由此，女性职业发展与其主体性之间建立起了稳定而多元的关系。

本书的研究力求回答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早期女工是如何历史性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她们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她们处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怎样的位置上？第二，女工是否是政治行动者？她们政治行动的力量是什么？第三，今天的女工与历史上的女工相比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她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否具有根本性的改变？第四，新中国的建立和妇女解放到底对妇女意味着什么？第五，在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是她们参加到社会公共领域中的思想影响下，女工获得了怎样的工作经验，这些工作经验对女工有怎样的意义？第六，改革开放所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对女工意味着什么？女工如何应对经济变迁？她们是“弱者”吗？第七，对于女工来说，工作和家庭真的是双重负担吗？她们是如何看待工作和家庭的？第八，女工的阶级属性是怎样的？她们与丈夫、父辈之间的阶级互动是怎样的？如何认识中国女工的阶级属性。

二 理 论 挑 战

2000年，我获得全国妇女理论研究会的支持从事了一项有关“中国妇女职业发展”的课题研究。这是对现代中国女性职业发展现状的研究，集中思考了三个问题：妇女的共性与差异性问题；女性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一）挑战之一：共性与差异性

研究的第一个挑战是有关妇女的“共性与差异性”问题，即妇女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利益整体？女工个体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纳为整体的经验。个人的经历如何上升为整体的性别的或阶级的体验与觉悟，这是本研究力求解释的一个问题。

在展现中国女工史时，首先面对的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女工；第二面对的是女工与其他职业类别的女性劳动者；第三面对的是女工与男工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从时间的角度看，不同历史时代的女工有着不同的工作经历，其共性是历史性的。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市场经济，中国女工同男性们一起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在以“劳动光荣”为使命的时代，出现了“男女都一样”的创举，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否真正消除了两性间的性别差异使两性工人得到全面的发展呢？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女工与男工一样经历了社会经济的结构调整，社会异质性程度提高，工人阶级遭遇历史的命运。阅读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仿佛走进历史的长河，女工的故事是河岸上多姿的风景，她们当下的生活正是明天的历史，但如果不对她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进行记录的话，她们很快就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得无声无息，就如同我在努力

寻找 20 世纪 50 年代女工的资料时感受到的：我们无法知道大批的家庭主妇走向工作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些妇女无声地走过历史。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 50 年后重演，因此尽力留下可能依然是微弱的声音和几个普通女工的故事，关注的问题是女工的工作和生活是如何历史性地嵌入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职业女性的生活境遇有天壤之别，妇女是个广义的概念，因为妇女本身有着阶级、城乡和教育背景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我难以用整体妇女的概念来论述其职业发展。我至少要把妇女分解为知识女性、女干部、女工和农民，这仅仅是职业类别的划分，还不包括地域的分化，她们之间职业发展路径是不同的，因此在进行细化研究时把研究定位于中国女工——工业企业中的女性工人。但妇女之间也有共性，2002 年有调查表明，有 30.5% 的女性认为，她们最大的压力是“经济”上的，其次是“工作压力”，占 28.55%；“工作和家庭难以兼顾”的占 9.69%（华坤女性调查中心，2002）。可以看出，无论是怎样的阶级或阶层处境，女性最大的压力来自与工作相关的日常生活，总计比例占到 69%，这些压力是身为女人所面临的共同境遇。因此我一直寻找女工的共同点：她们的工作经历、她们的工作渴望、她们给予工作的意义、她们感受到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她们的成就感和挫折感等等。

在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中，女工是否是一支可以独立于男工的力量？这是阶级与性别的交叉和重叠，对此不敢轻易下结论。中国女工的发展和变化与工人阶级整体命运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是深深嵌入在中国工业化的历史、经济制度、家庭结构以及有关价值的社会话语之中的。

（二）挑战之二：什么是女工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研究的第二个挑战是“自主性和能动性”问题。本研究的初

表是想说明女工是行动的主体，她们通过各种职业策略来实现对各种异化力量的抗争，那么女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是什么？如何展示女工自主性和能动性呢？

“我思故我在”，这是哲学家笛卡尔对“主体性”的清晰表述，强调的是自我的意识。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框架中，德国古典唯心论发展出的“自我意识的运动”突出对“主体性”的认识，他们提出的主体性概念包含着对人性的体现与思考。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生活世界”的概念超越德国古典唯心论，把主体性作为内涵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范畴来研究，“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伴随着对于“生活世界”的重视成为新的重要的哲学课题。胡塞尔在“生活世界”和“交互主体性”思想中突出“交往”和“有效性”的视角，随后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论”，强调从语义学的角度理解主体性，减弱了对于交往活动中真实互动意义的理解，强化了语言的作用和意义。由此，对主体性的认识可以沿着这样一个脉络：第一，主体性是与自我意识相联系的；第二，主体与客体之间并非是绝对的关系，而是相对的关系，存在交互主体性；第三，主体性是呈现在日常生活世界的真实互动；第四，主体性主要地呈现为意义世界，并借助语言表达出来。本研究强调主体性呈现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互动关系。中国女工主体性是她们相对于国家、男权社会、经济霸权、传统文化力量的个人存在。

长期的父权制文化使中国女性不仅是沉默者，而且还是附属者。中国文化中的父权制通过父系继嗣、从夫居和男女有别，使女性通过婚姻在家庭中处于依从地位，并决定了她们在社会中的从属性。女性一出生就注定要附属于她未来的丈夫，女性终生要对家庭为她挑选（包办婚姻）的合法丈夫保持忠贞；无论丈夫怎样对待她，她都不能与他离婚；即使丈夫比她先去世，她也不能改嫁；但她的丈夫却可以娶多个女人或再婚。这些成为中国文化

或儒家伦理文化中最黑暗和最无人道的部分，这种婚姻文化中的性别不平等在东汉早期的女史学家班昭的《女诫》中有最恰当的比喻“夫者天也。天固不可违，夫固不可离也。”天地之间的自然秩序表达了封建社会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公元前136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将其儒家思想系统化，变成国家学说。他在自然法规与人类关系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隐形关系。由此，他解释了儒家思想中三个基本的人伦关系，即按照阴阳、天地相对应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君子、父亲、丈夫是阳和天，臣子、儿子和妻子是阴和被天覆盖的地，由此形成了封建社会统治的主要原则——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一意义上，主体性相对于客体与从属地位，一切打破两性之间绝对权力关系的行动都是变客体为主体的积极行动。

有学者认为，受历史和建国后国家政府的影响，女性的自主性或自主意识是不足的（刘宁，1998；祖嘉和，1999）。女性的经济独立是精神独立的先决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精神上的独立与主体意识的形成，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未必导致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王小波，2000）。由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注重群体性，其主流不是“个性解放”；因而，在女性自主意识方面显得相对薄弱（夏国美，1998）。

上述种种分析不可说不正确，但主要的问题是女性被叙述为缺少自主性的。如果把自主性理解为精神独立的话，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女工的“精神世界”？本研究力求让女工自己说话，因为主体性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果它是以精神独立为核心内容的话，它一定是体现在女工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发生在她们与国家、文化、社会制度建构的互动关系中。

自主性的建立是赋权（empowerment）的过程，是增强自身的能力，是自力更生、自我组织以最终拥有改变现状的能力与力

量。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在其《性别平等政策》（1999）中论述了什么是赋权：

赋权是指人——女性和男性——能支配自己的生活：制定自己的生活议程，获得技能，建立信心，解决问题，能够自立。它不仅是集体的、社会的、政治的过程，而且还是个人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其他人不能给妇女赋权，只有妇女才能给自己赋权来代表自己进行选择或发言。

（林志斌、李小云，2001，37）

在赋权的意义上，中国女工工作的历史与现实体现了女工通过与职业相关的活动取得的获得资源能力的增长，它包括获得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能力的增长，这些能力具有可交换性。获取政治资源能力的增长是指女工通过有酬劳动不断参与政治生活以及政治生活意识、能力和地位的提高，如通过在工作岗位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获取经济资源能力的增长是指女工通过有酬劳动，经济收入和获取收入能力的提高，表明女工具有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增长是指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与个人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社会关系量的增长。社会资源是嵌入在个人通过其社会网络而连接的关系资源，包括了那些通过网络而连接起来的可以共享的资源。通过有酬劳动，女工可能获得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职业发展的一部分，社会关系网络深深地影响着职业的进入以及级别的晋升，中国是一个具有明显“差序格局”和依靠“特殊主义”原则行事的社会，社会关系网络的占有状况表明妇女职业发展的潜力。

女工史是动态的历史过程。从女工整体的角度看，女工史是女工获得职业地位的过程；从女工个体的角度看，女工经历

的职业学习以及职业进入、转岗、调动、提升、退休、下岗等重要的职业变化展示了女工个人主体性的有效性。女工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过程是赋权过程，这是女性自我发现、自我认识和自我成长的过程；是女性作为“人”走向社会、作用于社会的过程。职业有力地作用于女性主体性的建立，使女性成为具有自主独立意识、享受工作并富有社会公民责任感的社会行动者。中国女性通过职业实现着个人的自主性，包括自觉能动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等。工作岗位提供了女性建立自主性的场所，职业生活经由女性主体的反思具有了更重要的符号意义。

在写作的过程中，女工的“主体性”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主题，更多地成为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并最终通过方法论解决了有关女工主体性的问题。在主流研究中，女性一直被描述成是男性的附属者，人们便习惯地认为附属者的身份就是女性的身份。从方法论角度看，女工的“主体性”可以成为一种写作与叙述的手法，女工作为主体的叙述打破了传统“他者”地位的叙述，这种叙述本身足以明确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研究决定以女工为主体，用她们的语言、经历和感受展示她们对于工作和家庭的理解，将她们有关工作和生活的行动、观念置于其自身经济条件、文化情境中去理解，力求对女工有一种符合她们生活经验的理解。

（三）挑战之三：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依据社会心理学大师米德对于自我的论述，“自我在社会情境中实现”。在社会情境中实现的自我有几个特点：第一，自我出现在经验中，人们是共同体的一员，但他是共同体的一个特定成分，具有把他同任何他人区别开来的特定的遗传特征和地位；第二，所有自我都是凭借或通过社会过程而构成；第三，个体不

断对社会做出反映，使自己顺应社会，而他的每次顺应都涉及共同体的某种变化；第四，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可使我们实现自我。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的自我，它是在它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自我。它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才具有我们想要归之于它的那些价值（参见米德，1992，178—186）。在这一意义上，个体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

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是结构与行动的关系，它是社会学研究经久不衰的主题。人的主体性具有双重性，人既是能动的，同时也是受动的，受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制约。因此，主体总是与客体发生联系，主客体关系成为主体性实现的关键条件。历代的社会学大师们在处理这一难题时得出自己睿智的答案。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时指出：

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种一样，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不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造，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吉登斯，1998，61—62）

结构化理论具有的结构兼行动的理论构想和可能解释现实的理论潜力使我着迷，特别是有关结构的双重性，即社会的结构既是人类行动所建构，但它同时也是建构的媒介。透过社会

实践 (social practices) , 人不但有所行动还塑造社会结构 , 结构与行动构成人类社会实践一体的两面。在吉登斯看来 , 所谓的 “ 结构 ” 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的规则与资源 (吉登斯 , 1998 , 52) 。规则包括两种 —— 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号 , 资源也有两种 —— 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结构受着众多行动者的行动与彼此互动的影 响 , 结构对行动者不仅有约束力 , 还为行动者提供资源和便捷 , 使行动者能够实施社会实践。在这一意义上 , 女工的职业生活成为她们在社会结构中建构和被建构自身主体性的中介。本研究的反思是建立在结构化理论基础上的。在日常生活中 , 女工们真实地在家庭和工作中渡过自己的每一天 , 她们的利益和成就混杂在 “ 大家 ” —— 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以及 “ 小家 ” —— 家庭利益和家庭策略之中 , 这种日常生活就是多种结构性力量和女工主体性力量的有机互动。本研究希望通过各种互动关系和过程呈现女工被异化的状况和其抗争的努力。

三 研究 方法

(一) 研究立场

文章开始时我引用了刘思谦教授的一句话 , 在这句话中 , 她用了四个 “ 自己 ” , 这无疑是语言的不简练。我犯过同样的 “ 错误 ” , 被男性同行友善地批评为 “ 你能不能把那些 “ 自己 ” 全部删除 , 因为意思并没有变 , 句子会更简洁。 ” 很感激这些批评 , 但又不敢苟同 , 因为在我说出 “ 自己 ” 这一词时 , 力图表达的就是我这个自己 , 不是他人或她人 , 不是想表达一种共性。这时的 “ 自己 ” 更像是一种告白 , 力图表达某种 “ 不同 ” 和 “ 差别 ” , 是对 “ 自己 ” 独立的、不同于他 (她) 人的身份和立场的一种强调

和再强调。当然，这里的潜台词还在于他（她）人的语言并没有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觉、经验和思想。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作者要表明几点立场。

立场之一是倾听中国女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故事；并把这种“自己”定义为“主体性”——一种对生活和工作感觉、经验和思想的独立叙述和反思。这些叙述和反思表明女工不是“计划”、“市场”、“家庭”等结构因素下的被动者；它揭示出女工是有思想和自主决定能力的积极行动者，在强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约束下，在种种的历史境遇中，女工工作史反映着她们的个人能动性、选择的多样性和创造自主生活的潜力。

立场之二是把工人作为历史的主人，避免任何扭曲工人生活经验的理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女工工作史始于中国近现代的工业化，在1949年以后有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她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立场之三是作为主体的女工并不是抽象的个人，每个女工都是独立的个体，她们有特定的生活处境和生活策略。一方面，强调每个女工的工作路径和职业生涯是复杂多变且具有独立性的；另一方面在学术讨论上并不是把女工的工作史还原为个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中，而是把对女工史的理解置于国家力量、家庭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中。

立场之四是从性别发展的视角看待社会变迁与社会进步。如果我们使用傅丽叶的名言——妇女的解放是衡量一个时代人类解放的尺度的话，那么，我们会对历史上的许多现象得到令人震惊的评价。因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使资产阶级的妻子们专事家务以及对女巫愈演愈烈的跨阶级的迫害。因此，本研究以妇女解放为尺子来重新观察历史，这样的历史或许有不同的画面。

（二）多元方法的综合

多元研究方法是综合了多种不同的方法，也被称为三角交叉检视法，它源自“导航与战争策略”的用语。这种思考的基本假设是任何一种资料、方法和研究者均有其各自的偏差，只有纳入各种资料、方法和研究者时，才能达到一种“中和”。其思维框架不是沿着量化研究或质性研究的思维，不是“证伪”的过程，而是以“寻找值得信赖的诠释”为根据。从某种程度上讲，即使纳入量化研究，多元方法依然是质性研究的范畴（Brody, 1992）。本研究以口述史、文献资料、调查问卷的方法收集资料，互相检验、互补和整合，由此可以更深入和完整地了解中国女工的历史和现实，并具有反思的潜力。

本研究使用的口述史资料，把女工自我叙述的工作和生活经验、主观感受和解释作为取得资料的重要手段。口述史突破了历史来源必须取自于文字的限制，将历史的取材与资料来源扩展至相关人员的叙述，并将“历史的论释权”回归到那些经历了历史事件的人们。每位女工在其口述的过程中都是事件的参与者与解释者，这种口述史的方法对于没有权力的女工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使用的口述史资料来源于两个部分，一是直接深入访谈，倾听女工叙述她们的工作经历。它的基础是笔者在近五年时间内与学生们一起对 40 位女工做的访谈资料的整理，这 40 位女工分布在北京、沈阳、重庆、余姚、广水等地，她们皆有一线工作的经历，每位女工访谈时间在 1 个半小时以上，使用半结构性访谈提纲（访谈提纲见附录 1）。为了对当事人的权益加以保护，本研究在使用资料时全部使用了化名。二是收集史料的方法，使用已有的文本资料，进行再次挖掘、再次使用和再次阐释。资料收集的方法主要采用了陈达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市镇工人，特

别是对上海工人进行的调查和访谈（陈达，1993）。陈达先生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内容。此外，还有李小江主编的口述史资料《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李小江，2002）。在研究早期女工工作史时，本研究使用了陈达先生的12个访谈资料和李小江的两个访谈资料。特别感谢陈达先生的资料收集和袁方教授对《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一书的大力推荐，她融入了老一代社会学家对劳工问题的学术关怀和踏实的资料收集工作。本研究使用的文献资料还利用了一些历史资料，如报刊与杂志，以便清楚的认识历史与现实。

问卷调查资料主要来自于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本人作为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组成员和妇女法律地位调查小组负责人，有机会参与调查问卷的设计与资料分析工作。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是自1990年开始的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每十年进行一次，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进行。2000年结束的全国妇女社会地位的第二期调查共回收有效个人问卷19449份，其中男性为45.6%，女性为54.4%；城镇50.5%；农村为49.5%（问卷处理时进行了权数的调整）。这一调查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科学性方面都有很强的说服力，相关章节使用了这一资料，由于笔者参与了调查的全过程，且资料正在统计过程中，因此本研究未加注释的调查统计资料皆出自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第二期调查。

四 本书结构

本书分为两卷，上卷是中国女工工作史，下卷是当代中国女工职业生涯研究。

上卷的中国女工工作史主要是展示和分析中国女工自产生之

日起到今天的历史变化过程，它是女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第一章以时间为框架，分析从 19 世纪末开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女工以及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第二章论述女工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如何参与到中国工人运动的斗争中，由此认识女工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独立利益和有效的政治行动。第三章分析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从性别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两方面重建中国劳动性别分工的努力以及影响到女工日常生活世界的革命的意义。第四章分析新中国建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女工具有的特点，这种特点与她们成长的社会环境以及当时的文化和历史事件相互交融在一起。第五章分析改革开放对中国女工的再次塑造，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女工不仅利益受到损害，同时她们的阶级身份和性别身份再次被强化。第六章用历史事件分析了历史时间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重点强调 100 年来中国社会在男权文化、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中国政治等结构性因素并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的条件下，它们作用于女工的方式依然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

下卷是当代中国女工职业生涯历程中的工作史，是女工作为一名社会生产者的工作全程史，也是其职业发展史。第七章简单介绍生命历程的理论，分析中国女工在生命全程中的职业生涯及其职业生涯的嵌入性。第八章至第十一章是以女工自我叙述的工作历程为材料，用女工自己栩栩如生的故事，把她们的家庭背景、工作的进入、职业转换、与经济结构调整进行的种种整合、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以及未来子女的职业发展等相关问题一一展示出来。第十二章是从女工的视角展开对工作与家庭关系的讨论，在女工眼中家庭与工作并非是矛盾体，而是她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生活空间相互作用使她们感到自我的价值。第十二章是在家庭的框架下讨论女工的阶级属性，特别是父辈和丈夫对其阶级属性的影响。女工因其成长环境、社会网络关系和工人阶

级价值观的不断再生产而呈现出稳定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第十四章通过展示女工职业生涯的特点分析其自我认同，寻找工作如何异化和再创造，她们对工作、家庭和自我的理解。第十五章以女工劳动模范为样本分析国家力量如何与女工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互动，相互利用以实现各自目标的最大化，并由此反思当代工厂制度、工人阶级的整体地位、国家力量、社会意识形态、性别话语等对女工工作和生活的形塑。第十六章通过 10 位劳动法律权益受到损害的女工的经历，分析作为弱势群体的女工并不是弱者，由此重新定义职业发展，强调其通过职业经历获得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的能力的增长。